

曾伯棗簋考釋

屈萬里

一、前說

傳世的曾伯棗簋，器和蓋都有銘文（見附圖一、二）。由於器和蓋分藏在兩處，以致使不少的人誤以為是兩個器物。器的銘文共九十二個字；最初著錄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裏（見卷七。下文簡稱積古。）。後來，擴古錄金文（卷三之二。下文簡稱擴古。）、奇觚室吉金文述（卷一七。下文簡稱奇觚。）、綴遺齋彝器考釋（卷八。下文簡稱綴遺。）、周金文存（卷三）、小校經閣金文拓本（卷九。下文簡稱小校。）、三代吉金文存（卷十），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（二〇七葉。下文簡稱金圖。）等書，都曾著錄。此器原藏在阮芸臺的家裏（見小校九，張叔未跋。），後來燬於火（見金圖目錄表一四葉）。蓋的銘文，共九十個字。文辭和器銘全同；只是『于我皇且文考』句中，蓋銘無『且』字，又『曾伯棗殷不黃考』句中，蓋銘無『伯』字。蓋銘的字體，較器銘稍大。而書法的丰神，則完全一樣。蓋銘著錄於從古堂款識學（卷二。下文簡稱從古。）、密齋集古錄（卷一五）、擴古（卷三之二）、奇觚（卷五）、綴遺（卷八）、周金文存（卷三）、小校（卷九）、三代吉金文存（卷十），和金圖（二〇七葉）。蓋的實物，最初藏在長白斌笠耕家裏，後歸寧波周小厓（見小校張叔未跋），又後歸於灘縣陳簠齋（見綴遺八）；現則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。

考釋此器的，據我所知，最早的是積古。其後則有從古、奇觚、擴古、綴遺、雙劍謬吉金文選、吉金文錄，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（下文簡稱金釋）。各書的考釋，多是偏重於文字和句讀方面；探討銘文中所敍述的史實的，則較少。偶爾有談及它的年代或史事的，又都是三言兩語，略而不詳。而且，即使那三言兩語，除了張石匏外，也都沒有搔着癢處。

本文的目的，是選取前人在文字句讀方面所得的成果，並參以己見，以求明瞭全篇銘文的大意。更就史實方面，加以爬梳推證；希望能夠知道此器究竟作成在什麼時代；它所說的「克狄淮夷」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二、銘文釋義

曾伯秉簋的銘辭是（只錄器銘，蓋銘從略。）：

隹王九月，初吉庚午。曾白秉𠯃聖元武孔黹。克狄𠯃尸，印變巒湯。金衛
錫行，具既卑方。今彝其吉金黃鏽，今用自乍旅匱。目征目行，用盛稻梁。用
養用高于我皇且文考，天賜之福。曾白秉假不黃耆，嚮年饗耆無彊！子二孫
二，永寶用之高。

現在把這篇銘文，分句解說如下：

隹王九月，初吉庚午。

隹，是發語詞；和後世作發語詞用的維、惟、唯相同。王，和春秋『春王正月』
的王一樣，指周王朝的歷法而言。九月，當是周襄王十年（魯僖公十八年）的九
月（說詳第四節）。詩小雅小明篇：『二月初吉。』毛傳和鄭箋都說『初吉』是朔
日。後經王靜安考證的結果，認為初吉是每月一日到七八日（見觀堂集林生霸死
霸考）。茲從王氏說。依照董彥堂先生的中國年曆簡譜，周襄王十年的九月朔日
是癸亥；那麼，庚午是九月初八日了。

曾白秉𠯃聖元武孔黹。

此二句當讀作『曾白秉𠯃聖元武，元武孔黹』。它的寫法雖和兩個疊字相連的情
形相同（如子二孫二），而讀法却和石鼓文的『君子員二邇二員游』（讀作『君子
員邇，員邇員游』）一樣。積古（卷七）說：『曾，當卽鄧；夏之後。國爵爲伯，而春秋
作子者，意後王貶之也。』按：此曾是夏後之鄧，是可信的。至於後王貶爵之
說，恐怕難信。我以為曾很可能原來是子爵，而後來妄自稱爲伯爵。這類以低爵
而冒稱高爵的例子，在春秋時代是常有的。白，在金文裏經常當作伯仲的伯字用；
這裏是用作公侯伯子男的伯。秉，是曾伯的名子。積古引吳侃如說，以為是秉
字。後來的學者，很多人遵從這一個說法。奇觚因爲秉並不从彑，說它不可能是

篆字；而認為它應該寫作篆，也就是黍字（說見卷五）。綴遺（卷八）則以為此字从雨从𣎵；𣎵，从木不从禾」，因而隸定作𣎵，並認為𣎵或許是黍的籀文。按：𣎵，正象樹上的漆汁『如水滴而下』（說文語），當是古黍（今通作漆）字。茲從原字形，隸定作𣎵。此字應當是从雨、黍聲，而未必就是黍字。可惜後世的字書裏沒有這個字，所以就無法知道它的意義了。𢂑，當即𢂑字。𢂑字屢見於漢書，和哲字相同。漢書五行志（卷中之下）說：『𢂑，知也。』聖，是明達的意思。元字在古書裏最常見的意義是始，首、長、大，都是始義的引申。這裏把元講作始或大，固然都可以；但如此講來，則元字必須是武的副詞。而𢂑、聖、元、武，顯然是四字平列，各自爲義。因此我覺得用周書（卷六）諡法篇『行義說民曰元』或『主義行德曰元』的意義來解釋它，似乎比較好些。𦥑，積古以爲是業字；從古、攢古、𡇠齋、奇觚，都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一說法。吉金文錄，也把它寫作業；但却說：『孔𦥑業字，或以爲疑；吾以爲當讀孔常，乃與下韻。』金釋（一八六葉）因而說：『𦥑乃常之異文。說文：「常，下帀也；从巾，尙聲。裳，常或从衣。」此从巾从𣎵省。蓋常若裳乃形聲字，此乃會意字。此讀爲堂皇之堂，高也，盛也；聲正入韻。』綴遺則釋爲光，它說：『此字上从山，火字也。說文：光，古文作𦥑，又作𦥑，可證。』按：業，常，光，和𦥑的形狀都不像，可以決定上述的說法都不對。雙劍謬吉金文選說：『𦥑，舊釋爲業；似是𣎵字。休盤𣎵作𦥑，害殷𣎵作𦥑。但𢂑聖元武，元武孔𣎵，不得其解耳。』現在從字形上看，𦥑是𣎵字，似無可疑。而休盤說：『王乎作冊尹，冊易休玄衣𣎵（純），……』；害殷也說：『王冊命害曰：「易女翠朱𣎵，玄衣𣎵，……」』。按詩小雅采菽：『又何予之？玄衣及𣎵。』玄衣，就是休盤和害殷的玄衣；𣎵，當即此二器的𣎵。那麼，這𣎵字，實就是後世的𣎵字（王靜安以爲甲骨文的𣎵是黻字，已近是而未的。）。𣎵字和上文的午、武爲韻。爾雅釋言：『𣎵黻，彰也。』𣎵，是白黑相間的花紋，所以有章或彰的意思。爾雅疏說：『彰，明也；言文采著明也。』這話是不錯的。那麼，元武孔𣎵，就是說曾伯秉的『義氣和武威是非常彰著的』了。

狄，積古誤釋爲攷。後來諸家都釋作狄，是不錯的。詩魯頌泮水：『桓桓于征，狄彼東南。』鄭箋說：『狄，當作剔。剔，治也。』大雅抑：『用遏蠻方。』鄭箋也說：『遏，當作剔。剔，治也。』古代从狄的字和从易的字，常常相通。譬如史記殷本記：『母曰簡狄。』索隱說：『狄，舊本作易，又作遏。』說文：『惕，敬也；从心，易聲。慄，或从狄。』由此看來，泮水的狄，也就是抑的遏，它們是同音通義。鄭康成又拿同音的剔字來解釋它們，而說是『治也』；這治字應該是懲治的意思(高本漢的詩經注釋——董同龢譯本——，說：『鄭氏的「治」分明就是「治罪，懲處，擊破」的意思。』這解釋是很對的。)。淮尸，就是淮夷。從古說：『淮字从唯；古文隹，亦作唯。夷，古文作厃；此厃，卽厃之省。』按：徐氏說淮字，言簡意明，可說是一語破的。至於說厃是厃的省文，則還有商量的餘地。其實厃就是古時的夷字，吳清卿的字說裏，有專文討論它，這裏不再詳述。從古又說：『印，當讀爲抑。』說文云：『抑，按也；从反印。』按：甲骨文也有這個字。從字形看來，象一隻手(爪)按住一個跪着的人；當是抑的本字。不過在這裏應該當作『安』字講，文義才順適。方言卷十三，廣雅釋詁二，都有抑字作『安』解的說法。綴遺說：『變蠻湯，與詩大明「變伐大商」同意；毛傳云：「變，和也。」』蠻湯，奇觚以爲是兩個地名。劉節則認爲是一個地名；並且以爲它就是定公六年左傳杜注『楚地，在汝南飼陽縣南』的繁陽(詳見下文)。這說法是比較近理的。因爲從地形上看，此地是介乎楚、陳、淮夷之間。杜注說是楚地，可知它後來是屬於楚的。此地在現今河南新蔡縣東北約七十里的地方，在淮水以北。就地勢說，它當是齊、魯、鄆、杞、滕、邾、宋、陳等國往淮南的孔道，也就是輸入南金的重地。這次伐淮夷，似乎是把這要道打通了，所以說『印變蠻湯』。

金衛錫行，具旣卑方。

衛，古道字。錫，綴遺以爲是錫字。按：金文裏錫賜的錫字，絕大多數都作易。而本器的『天賜之福』，則加目旁作賜。可知本器的賜，也就是他器中通作的易。那麼，賜字再加金旁，就等於易加金旁，也就是錫字了。這裏的錫字，

是銅錫之錫。可能是爲了別於錫賜之易，因而特別加了個金字旁。吉金文錄(卷四)說：『金道，產金之地。行，亦道也。此言產金錫之區，皆已入版圖，歸我方域。』這話雖不全對，可是很富於啓發性。按：金道，當是指輸入銅的道路而言。錫行，當是指輸入錫的道路而言。金釋(一八六葉)說：『「金道錫行」者，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。吉者南方多產金錫。』魯頌泮水：『憬彼淮夷，來獻其琛：元龜象齒，大賂南金。』考工記云：『吳粵之金錫，此材之美者也。』這說法是不錯的。詩小雅楚茨：『神具醉止。』鄭箋說：『具，皆也。』具既，等於說皆已。卑，和俾通用。詩小雅蕘柳：『俾予靖之。』釋文說：『俾，本作卑。』禮記大學：『而違之俾不通。』釋文也說：『俾，本作卑。』這都是卑俾通用的證據。詩邶風日月：『俾也可忘。』鄭箋說：『俾，使也。』這是俾字最常見的意義。方，是常的意思。論語里仁篇：『遊必有方。』皇侃疏說：『方，常也。』國語晉語：『官方定物。』韋昭注也說：『方，常也。』此外的例證還很多，這裏不再列舉。那麼，『具既卑方』，就是說『皆已使它如常』了。

今彝其吉金黃鏽，今用自乍旅匱；目征目行，用盛稻粱。

今，就是余字。在甲骨文、和金文裏，或作余，或作余，而以寫作今的爲多。彝和擇，在說文裏是兩個字，各有不同的意義。但在金文中，擇字通通作彝；本銘的彝字，也不例外。詩召南摽有梅：『迨其吉兮。』毛傳：『吉，善也。』吉金，就是良好的銅。鏽，奇觚說說：『說文臚，籀文作膚。知盧膚同字。此黃鏽當是金名；或竟是鑪。』說文：『鑪，方鑪也。』以鑪鑄簋者，所謂彝吉金也。』金釋承襲了這個說法，說：『黃鏽者，以銅所爲之鑪(原注：今言火盆。)；言毀銷之以爲彝器也。』今按：古人固然有銷毀他器另鑄新器的事。但，邾公華鐘：『盍公華彝卒吉金，玄鏹赤鏽，用鑄卒龢鐘。』郈鐘：『作爲余鐘，玄鏹鏽鋁。』居趣戲彝：『君禽余三鑪，……余鑄此廟兒。』從這些銘辭看來，何以都銷毀了鑪而改造鐘、彝、簋等類的器物？所以劉氏的後一說和郭氏的說法，恐怕不合事實。我覺得劉氏的前一說似乎合理些。鏽，是不是鑪字，還難肯定；但它可能是銅的一種；猶如剛硬的鐵而另叫作鏽一樣。這樣解釋，不但可使大家都不必專門毀鑪而另造他器；而且『黃鏽』、『赤鏽』的字樣，也都容易瞭解了。乍，即作

字；甲骨文和金文的作字都是這樣的寫法。旅，當是旅行的意思。匱，乃古簠字；金文中的簠字大多數是這樣寫法。商承祚說：『鄭子簠作匱，从匚；後遂由匚變古。』（殷虛書契類編）匚，是古代的缶字。從聲音上看來，商氏的說法是可信的。目，就是以字。征，本來也可以當作行講；這裏和行字並用，似乎是征伐的意思。說文說簠是盛黍稷的圜器。容氏金文編說：『今證之古器，侈口而長方，與周禮舍人注「方曰簠」之說同。周禮掌客「簠十」注：「簠，稻粱器也。」今銘辭多云「用盛稻梁」，則黍稷之說亦非。』本銘也說『用盛稻梁』，可見簠確是盛稻梁之器。許叔重的說法，可能是因殼而致誤的。

用養用高于我皇且文考；天賜之福。曾伯秉不黃耆，嚮年膚耆無疆！

用孝用高，是金文裏常見的話語；從而證知這裏的養字，必定是孝字的異體。高，在書本文獻裏多寫作享。詩小雅天保『是用孝享。』毛傳說：『享，獻也。』在古書裏常常當作奉獻祭品解，所以它也有祭祀的意思。甲骨文的祖字都作且；在金文裏，大多數也是這樣。皇且，是說偉大的祖先。周人對於亡故的人喜歡用『文』字去形容他們：如亡故的祖先，叫做文祖；亡故的母親，叫做文母；泛稱亡故的人，叫做前文人等。所以文考，就是亡故的父親。賜，諸家都以為是錫賜的錫字。它雖然和一般的寫法（作易）不同；但從文義來看，釋作錫字是不錯的。古書中的遐字或假字，在金文裏只作匱。詩小雅南山有臺：『遐不黃耆！』正和本銘的句子相同。朱子以為遐是『何』的意思；清人以為當是『胡』的假借字；這都是很可取的說法。黃耆的字樣，又見於詩大雅的行葦。南山有臺的毛傳說：『黃，黃髮也。耆，老。』證以魯頌閟宮的『黃髮台背』，知道黃字解作黃髮是對的。老年人的白髮，久而久之，又變成了金黃色。所以黃髮的人，比起白髮的人來，年壽更高些。黃耆，就是黃髮的老壽之象。萬字作嚮，在金文裏常有這種寫法，如刺鼎、鬲攸比鼎、叔弒殷、師賁殷、和庚羸匱的萬字，都是這樣。膚耆，就是眉壽。在金文裏，這兩個字的寫法，雖然有繁簡的不同，但大致都相差不遠。金文裏的疆字都作彊，沒有从土的。

子二孫二，永寶用之高。

在金文裏，『永寶用高』的句子常見；本銘加了一個『之』字。高，還是祭祀時奉

獻祭品的意思。

綜合本銘的全文，是說：『啊，(周)王的九月，月初的庚午那天。(我)曾國的國君名子叫做龔的，睿智明達而又義氣威武，(我的)義氣和威武是很彰著的。(我)能够懲治了淮夷，安定和平了蠻湯這個地方。輸入金(銅)和錫的道路，已經使它照常了。我選擇了良好的銅——黃鏽，我用來自己作了旅行用的簠。用以出征，用以旅行，用以盛裝稻和粱(稻米或小米做的飯)。用來孝敬、祭獻我偉大的祖先和亡故的父親，老天錫賜給(我)福祿。(我)曾伯龔怎能不會活到黃髮老壽、高壽到萬年無窮無盡呢！(我的)子子孫孫，(要)永遠寶重它用它來祭享。』

這銘文是有韻的。首段午、武、黹一韻；其次湯、行、方一韻；再次鏽、匱一韻；再次行、粱一韻；再次考、福一韻(金釋說：『考、福，幽、之合韻。』)；最後疊、蕡一韻。

三、鄆的地望和有關的史實

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說：

鄆。子。姒。禹後。今山東兗州府澤縣東八十里有鄆城。僖十四年見。襄六年，滅于莒。昭四年，地入于魯。

友人陳槃庵先生的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六本）說：

案：僖十四年左氏春秋釋文：『鄆，本或作繪。』左傳通作鄆，唯宣十八年傳作繪。哀七年左傳作鄆衍；杜注：『卽鄆也。』公羊亦作鄆。吳世家、魯世家、孔子世家、魏策、穀梁、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並作繪。荀子堯問篇：『繪丘之封人。』注：『繪與鄆同。鄆丘，故國。』是荀子亦作繪。周語二或作繪，或作鄆。

今按：古代的地名，其从邑的偏旁；常常有後人加入的。例如北、庸之作鄆，襄之作鄭，寺之作鄆，盍之作鄆等皆是。那麼，曾伯棗簠的曾，就是後世所寫的鄆；在字形的變化上來說，是不成問題的。由於左傳及穀梁傳互證，那麼，鄆就是繪，也是沒有問題的。鄆，又叫做鄆衍，猶之乎鄆又叫做鄆襄。至於鄆丘的名子，其義猶如『鄆

的故墟』；和商又叫做商丘一樣。這些也都不成問題。

僖公三十一年左傳說：

冬，狄圍衛，衛遷于帝丘。卜曰：三百年。衛成公夢康叔曰：『相奪予享。』公命祀相。寧武子不可。曰：『鬼神非其族類，不歆其祀。杞鄫何事？相之不享，於此久矣，非衛之罪也。』

杜注說：『言杞鄫夏後，自當祀相。』又國語周語下：

有夏雖衰，杞鄫猶在。

從這些史料來看，鄫是夏之後，也是可信的。不過宣公十八年左傳的繪，則當是另一個繪地，而不是夏後的鄫國。左傳的原文是：

十八年，春，晉侯、衛大子臧伐齊，至於陽穀。齊侯會晉侯盟于繪，以公子彊爲質，晉師還。蔡朝、南郭偃逃歸。

這一次的會盟，是由於晉和衛的攻齊；與鄫國無涉。齊衛之軍所到的地方是陽穀，距離鄫國很遠。那麼，他們不會越過了不相干的魯國，而又遠到另一個不相干的國家（鄫）去會盟，是可以斷言的。所以這裏的繪，很可能是齊國西部的地名，而不是夏後的鄫國。

不過，從金文的史料裏，可以證知還有一個姬姓的曾國。劉節的壽縣所出楚器考釋（民國二十四年北平圖書館印本，後收入古史考存。此據古史考存本。）說：

考之史冊，曾國有二。其在山東者，附庸於齊。故國策魏策曰：『繪恃齊而輕越』；春秋僖公十四年經曰：『季姬及鄫子遇于防』；左氏襄公六年傳曰：『莒滅鄫』；又十四年傳曰：『公請屬鄫』；哀公七年傳曰：『公會吳於鄫』；杜預注曰：『鄫，今鄆州鄆縣』；江永曰：『今兗州嶧縣東有鄫城。』此姒姓之國，即周語所謂杞繪由太姒也。左氏僖公三十一年傳曰：『杞繪夏後，自當祀相。』（里按：這是杜注的話，不是左傳的話。繪，杜注作鄫。）故史家皆以鄫爲姓。然在古器之中求之，若曾伯陮壺、曾太保益、曾子仲宣鼎、曾諸子鼎，皆無直接證據可斷定爲姒姓之國。反之，若曾伯秉簠、若曾侯簠，其與楚國之關係，則顯而易見。此在河南者，附庸於鄭之曾也。水經洧水注：『鄫人者，鄭人也。』（里按：戴校水經注云：『鄫人者，鄭國也。』鄭東遷據虢鄫之地，故

云。劉氏引鄆作鄫，誤。)左氏襄公元年傳：『次于鄫』，杜氏註曰：『鄭地，在陳留襄邑縣東南』；江永曰：『襄邑，今歸德睢州，故鄫城在州南。』余以爲此卽姬姓之曾，與曾伯棗同族，故徐鍇說文繫傳引杜預曰：『鄫，姬姓。』徐氏曰：『與說文同；或寫作姒者，誤。』而杜氏於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註又曰：『鄫，姒姓。』章昭國語註亦云：『鄫，姒姓。』可見有姬姓之鄫，又有姒姓之鄫。在齊者，姒姓；在鄭者，姬姓也。江漢諸姬，大抵周人播遷以同化江淮之民。是以姬姓之鄫，或在王室，或處夷狄。曾伯棗簠曰：『隹王九月，初吉庚午。曾伯棗(里按：原文如此；當作棗。)哲聖元武，元武孔業；克狄淮夷，印燮鄼湯。』可見征淮夷之役，曾伯棗與於其事，因率其族人南徙于楚，是以有楚國之曾矣。然則楚鄭之鄫是否同族，此尙待研討者也。曾伯棗簠有『印燮鄼湯』之文，此鄼湯必爲地名。其名又見於晉姜鼎，曰：『卑貫通弘，征繁湯臘。』此『繁湯原』之名雖同鄼湯，但是否一地，亦待考證。曾伯棗簠遠在晉姜鼎之前，而晉姜鼎則作於晉文侯之後。同名而時代不同，亦當分別論之。古以繁爲地名者，在戰國以前有二『繁陽』。史記趙世家孝成王二十一年，廉頗攻魏繁陽拔之。漢置繁陽縣於此，應劭云：在繁水北，故名繁陽。卽水經河水注所謂浮水故瀆水，旁有澤曰瀆淵，亦曰繁淵，卽所謂繁湯原也。其二，春秋楚地名。左氏襄公四年傳曰：『楚師爲陳叛故，猶在繁陽。』又定公六年傳曰：『吳敗楚舟師，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。』(里案：陽，或作揚。)杜預注曰：『繁陽，楚地；在汝南鷦陽縣南。』余以爲此繁陽，卽曾伯棗簠之鄼湯。蓋古之地名，往往因部族之遷徙而移置。晉姜鼎之繁湯原，其地在魏。曾伯棗因平淮夷而南行，故所謂鄼湯者，其地在楚。因處其族人於此；由是稍南移，乃邑於西旛。然則，楚之曾卽鄭之曾南徙而來，亦可略得其線索矣。曾之在鄭，以澮水得名。澮水出鄭縣西北平地，亦稱溱水，卽詩所謂溱與洧者也。鄭與鄫皆姬姓，近在王畿，是曾伯棗一族本處於鄭，故爲王近臣。因平淮夷而徙於楚，復爲楚之附庸矣。左傳哀公四年：『致方城之外于縉關』，杜注：『縉關，楚地。』江永曰：『在南陽府裕州。』國語晉語：『申人、縉人，召西戎以伐周。』申亦姬姓，(里案：申，姜姓。劉氏誤。)邑於謝方，卽今南陽府之

地。則曾與申又相近。由是歸納之，自東周中葉以迄戰國晚期，曾人之足跡北起鄭郊，南及光州；西起南陽，東抵睢州；皆其範圍也。是以其民與江淮間諸小國皆通婚姻，而與楚之王族關係尤深。曾侯簠曰：『叔姬鑄作黃邦，曾侯作叔姬卽婦臘器。』此器所謂叔姬，必爲曾侯之妹或女嫁于黃國者。卽婦者，乃叔姬之女嫁於江國者也。……曾姬無卹壺者，聖趙之夫人所作器也。夫人，國君之妻。聖趙卽聲趙。楚自惠王以後其小君可稱聲趙者，必爲聲王之夫人。娶於曾，故稱曾姬。無卹，其名也。

按：劉氏根據曾侯簠和曾姬無卹壺，以證明除姓姬的鄆之外，還有一個姓曾；其說可信。在劉氏此文的前一段裏，他根據曾侯鐘的『隹王五十又六祀，这自西旛，楚王鑄作曾侯乙宗彝，寔之于西旛，其永時用之』等語，認爲姓姬之曾的國邑，就是漢代屬於江夏郡的西陽國（在東漢時屬於荊州）。這說法似乎也很正確。至於關於鄆的其他論證，則誤處頗多。現在把它的重大錯誤，見於上面上引的一段文字中的，略爲辨證如下：

一、在山東的鄆，並非附庸於齊。此事陳槃庵先生在他的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（出處見前）裏，已經辨明。他說：

襄六年春秋：『莒人滅鄆。』左傳：『莒人滅鄆，鄆恃賂也。』昭四年經：『（魯）取鄆。』傳：『莒亂，著丘公立而不撫鄆，鄆叛而來，故曰取。』經傳記鄆之滅，事甚著明，而魏策云：『繒恃齊而輕越。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。』此恐誤。

吳師道補注曰：『（杜）注：鄆有貢賦之賂在魯，恃之而慢莒。此或訛爲齊。』據此，可知鄆附庸於齊之說，乃是戰國時人傳說之誤。何況魏策所謂和子之亂，當是指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一事而言。這事是在康公的十四年，也就是周安王的十一年。上去莒人滅鄆之歲，已經一百七十多年；即距魯人取鄆之歲，也已一百四十多年。可見國策之說之不足信了。

二、所謂『附庸於鄭之曾』，也有問題。劉氏根據水經洧水注『鄆人者，鄭人也』之語，又因鄭有澮水，於是說『曾之在鄭，以澮水得名。』按：洧水注的鄆字，是鄆字之誤，上文已經說明。至於說『曾之在鄭，以澮水得名』，這話也是錯誤的。水經洧水注說（據戴氏校本）：

澮水出鄆城西北雞絡塢下，東南流經賈復城西，東南流左合澮水。………澮水又南，左合承雲山水。………澮水又東南流，歷下田川，逕鄆城西，謂之爲柳泉水也。………澮水又南，懸流奔壑，崩注丈餘。………又南注於洧。詩所謂『溱與洧』者也。

可知澮水的流域，不出於今河南省的密縣和新鄭兩縣的縣境。而杜氏注左傳，所謂『在陳留襄邑縣東南』的鄆，是在清代的睢州，也就是現代的睢縣。它距離澮水流域遙遠的很，怎麼會因澮水而得名呢？這是絕對說不過去的。

而且，依照睢州之鄆的地望來說，在春秋時，它距離宋、陳兩國最近。清代乾隆年間所修的河南通志（參加分纂的人有顧棟高），以為睢州之地，在春秋時代，分屬於陳、宋（見沿革表），應該是很正確的。襄公元年左傳的杜注，說它是鄭地，事實上恐怕大有問題。因為此地在宋、陳之東，遠在西部的鄭國，怎麼可能越過了宋、陳，而領有鄆地呢？

三、陳留襄邑之鄆，不是姬姓之曾。說文的鄆，明說是『姓國，在東海。』這是絕不可能另有其他解釋的。徐鍇所引的杜預之說，顯然是根據了誤本的左傳杜注，以及誤本的說文（疑皆因姬形而誤），而妄為之說的。徐氏的錯誤，桂未谷的說文義證，和席世昌的讀說文記，早就辨正過了。劉氏把徐鍇論東海之鄆的謬說，又加在襄邑之鄆的身上，更是誤中之誤。何況襄邑之鄆，既絕不可能因澮水得名，更絕不『近在王畿』（西周的王畿）。而曾伯秉簠之鑄成，決不會早到西周時代，自然曾伯秉不會參加周宣王時的伐淮夷之役（說見下文）。至於說曾伯秉『因率其族人南徙于楚』，是以有楚國之曾。』更是毫無根據的臆說。

從地望上去看，今河南省東南部這一地帶，多是周人分封『亡國之餘』的地方。陳是舜之後，宋是商之後，杞是夏之後。襄邑之鄆，和杞緊鄰；照理說它應該是姓國，而決不會是附於楚的姬姓之曾。由於杞的一遷緣陵，再遷淳于看來；原在襄邑之鄆，東遷到東海，似乎也是事理之常。所以傅孟真先生說（見傅孟真先生集中編夷夏東西說）：

周語下：『有夏雖衰，杞鄆猶在。』按：杞在春秋時，由今杞縣境東遷。鄆則杜云：『在瑯琊鄆縣』（原注：『僖十四』。）。然國語記西周亡時事云：『申、

繪、西戎方彊，王室方騷。……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。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，周不守矣。』果鄧在鄖，勢難與申、西戎會伐周。然則鄧在鄖，亦是後來東遷所至。

按：傅先生說鄧在鄖，是東遷所至；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不過，東遷的鄧，照地理的形勢看，應該是襄邑之鄧，而不是靠近申和西戎之繪。因為靠近申和西戎之繪，當楚惠王五十六年時（西元前四三一年；此年代據劉節所考定），曾『返自西旛』，曾侯鐘的銘文中雖沒說明徙到什麼地方；但在楚惠王五十六年以前，繪還在西陽，是無可疑的。即此，已可知鄖之鄧，不是靠近申和西戎的繪了。

總括上述的論證，可以得到以下的兩個要點：

一、姒姓的鄧，原在今河南省的睢縣境，與杞為鄰；後來遷徙到今山東省驛縣的東南方。它始封於西周初年，亡於魯襄公六年（西元前五六七）。

二、另有和申及西戎鄰近的繪，是姬姓之國（當是江漢諸姬之一）；它的都城原在西陽（今湖北省襄陽境），後又遷徙他處（當在楚的領域之內）。它的始封之年，雖不可考；但總當在召穆公虎平定江漢之域以後。由於申伯之邑於謝，也在召虎平定江漢之域以後，可證。到了春秋初年，『江漢諸姬，楚實盡之』之後，當即成了楚的附庸國。

四、由器的本身看曾伯秉簠鑄成的時代

清代考證此簠作成之年代的人很少。從古雖然提到僖公十六年左傳、和鄭氏詩譜所載伐淮夷的史實；但徐氏並未言及此簠銘文中所說的『克狄淮夷』，就是魯僖公十六年會於淮的事。清人說到此器之鑄成時代的，似乎只有張石匏一人。他說（據古三之二引）：

左僖十六年傳：『會于淮，謀鄧，爲淮夷病故。』當即是事。

按：張氏的話說得雖然簡單，沒有任何論證；但却是一語破的。可惜後來的學者，都沒重視他的意見。

近人談到此器鑄成之時代的，據我所知的，共有三家。吳其昌在金文歷溯疏證中（卷五、二六葉）推算此器的『隹王九月，初吉庚午』，是周宣王九年的九月初二日。

他說：

是器不銘年，但記有『克狄淮夷』，知曾伯秉亦克淮夷之一人。克淮夷後，事越數年，猶銘器記功，以示不忘，其功績可知。伐淮夷在宣王元年；自宣王元年數起，九月初吉中有庚午者，實以宣王九年爲最先見，故知此器，至早當在宣王九年也。

據此，可知吳氏所以推算此器作成在宣王九年的證據，只是由於『克狄淮夷』一語。按理說：銘記戰功的器物，若在戰後的一二年或二三年之內鑄成，尙屬事理之常。何以竟遲到九年、甚至九年以後？這決不是用『其功績可知』的理由，就可以解釋的。而且，誠如吳氏所說：『宣王九年以外，九月初吉中有庚午者，推之可至無窮。』但，吳氏何以捨棄與鄫國有關年月日又相合的魯僖公時『會于淮』的史實而不用，偏偏採用與鄫無關而年代又不合的宣王九年呢？這是不容易說得過去的。

郭某在他的金釋(一八六葉)中說：

此簠與晉姜鼎同時，彼云『征穌湯原』，此云『印變蠻湯』，蓋晉人與曾同伐淮夷也。作器亦同在九月，彼在乙亥，此在庚午，先彼五日。彼云『勿灋(廢)文侯覲命』，知不在文侯以前。謚之興，在春秋中葉以後，或即文侯時事，亦有可能。要之，二器均春秋初年之物。

按：春秋初年，晉國絕無伐淮夷的事，更絕無與鄫同伐淮夷之說。以地望來看，晉姜鼎的穌湯原，當在澶淵附近；此器的蠻湯，當在今新蔡縣之東北。二者絕非一事。郭氏根據一個似是而非的地名，從而推定此器與晉姜鼎同時，實在是太武斷了。

此外，劉節在他的壽縣所出楚器考釋裏，也認爲此器的『克狄淮夷』，就是周宣王時代伐淮夷的事。因而說：『可見征淮夷之役，曾伯秉與於其事。』並且說：『曾伯秉簠遠在晉姜鼎之前』。但是，他並沒說明有什麼理由，來支持他這一個意見。所以，這裏也不再予以評論了。

現在，我們試從各個角度，來觀察此器作成的年代：

第一，從出土的彝器來看，簠這種器物，在西周後期才有。到戰國晚年，還在流行着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此器的鑄成，可能早到西周的晚葉，也可能遲到戰國晚年。

第二，從鄫的存滅來說，此器的曾，如果是姓鄫，則此器的鑄成，不出西周

曾伯秉簠考釋

晚葉到魯襄公六年這一期間。如果是姬姓之繪，則其鑄成時期，不出於召穆公平定江漢之域之後（周宣王時），到戰國晚年這一期間。但召穆公未平定江漢之域以前，姬姓之鄆還沒有立國，自無從往伐淮夷，而又鑄器銘功。等到附庸於楚之後，更不會以么麼小國，遠到東方，去伐和楚國素無怨恨的淮夷。可知此器的曾，是姓之鄆。而此器的鑄成時期，早則可能到西周晚葉，遲則不會晚於魯襄公六年。

第三，從詩大雅的江漢和常武兩篇看來，召穆公主要的是平定江漢之域，而又轉師東向，『鋪敦淮濱』。那麼，他所平定的，當是淮南之夷。程伯休父，則『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。』他所平定的，乃是淮北之夷。（此略本王應麟說，見詩地理考。）這兩件事情，都沒說到有什麼諸侯參加征伐，更沒提到鄆國。如果說鄆國事實上曾參加戰役，而文獻無徵。然而，那時還不是諸侯自專征伐的時代，則曾伯秉簠的銘文裏，應該有秉承王命的字樣，而不應該是那種自專征伐的口氣。反之，魯僖公十六年的淮之會，左傳明說是：『謀鄆，且東略也。』杜注更申明說：『鄆爲淮夷所病故』（後文尚有詳說）。可見曾伯秉簠的『克狄淮夷』，所指的就是這一件史實。

第四，從此器的花紋來看（附圖三），它腹部的主要花紋，是兩虺形互相糾纏，合乎容庚所稱爲蟠虺紋的形狀。這種花紋，據容庚研究的結果（見商周彝器通考及殷周青銅器通論），是通行於春秋和戰國的時期。像秦公盤（附圖四）、陳侯壺（附圖五）、和蟠夔鼎（附圖六）等，這些春秋或戰國時的器物，它們的花紋，都和此器相似。這都說明了此器的鑄成，不會早到春秋以前。而鄆國亡於魯襄公六年，從而證知此器當鑄成於春秋的初葉到中葉。所以在花紋方面來說，它也和魯僖公的時代恰合。

第五，從字體的風格來看，它和楚公釂鐘、楚王禽章鐘、曾姬無卹壺、王子申盞、楚王禽志鼎、楚王禽志盤、楚王禽背簋、楚王禽背簠等楚器的丰神，完全異趣；而和魯伯厚父盤、魯仲姬艅盤、孟姬姜盤、魯伯愈父鬲（以上魯器）、滕虎盤（以上滕器）、薛侯盤、薛侯匜（以上薛器）等，則非常相近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此器之曾，也必定是隣近魯、滕、薛諸國的姓之鄆，而不是附庸於楚國的姓之繪。

第六，從銘辭的風格來看，它那種自吹自擂的諛辭，很像魯頌的泮水和閟宮。『克狄淮夷』的狄字，其用法和泮水『狄彼東南』的狄字完全相同。在古代文獻裏，狄字這種用法，此器和泮水，真是無獨有偶。從而可以知道鄆和魯在文化交流方面的

關係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此器之曾，也自以姓氏之鄆的可能性為大。

綜合上述的論證，可以得到兩個結論：（一）、曾伯秉簠之曾，是姓氏之鄆，而不是姬姓之繒。（二）、此器之作成，當在魯僖公十六年諸侯會于淮之後的數年以內。

按：僖公十九年春秋經說：『夏六月，宋公、曹人、邾人，盟于曹南。鄆子會于邾。己酉，邾人執鄆子，用之。』左傳說：『宋公使鄭文公，用鄆子于次睢之社，欲以屬東夷。』此被用為犧牲的鄆子，當即是參加僖公十六年淮夷戰役（實有戰事，說詳後文。）的鄆國之君，也就是曾伯秉簠中號稱曾伯的秉。而淮之戰，約結束在僖公十七年的春夏間（是年春，魯師滅項，是因伐淮夷而作的順手牽羊之舉。魯僖公被齊人捉去，到九月才回魯。）。那麼，此簠的作成，當在魯僖公十七年夏到十九年夏這兩年的期間。恰巧僖公十八年九月的初吉（初八日）有庚午，可知此器之作，必在這時候了。

五、克狄淮夷的故事

周宣王時代，召穆公曾經『鋪敦淮濱』，程伯休父也曾『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』。但這二事都和曾伯秉簠的條件不合，說已見上。傳統的歷史中，曾有伯禽伐淮夷的記載；那是由於誤會了尚書費誓之篇，以致把魯僖公的史實，加在伯禽的身上（說見後文）。而和鄆事有關又和曾伯秉簠之條件相合的伐淮夷之役，只有魯僖公十六年諸侯會于淮的那一史實，前文也已經說過。現在，我們看春秋和左傳的記載：

冬，十有二月，公會齊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鄭伯、許男、邢侯、曹伯于淮。（僖公十六年經）

十二月，會于淮，謀鄆，且東略也。（杜注：『鄆為淮夷所病故。』）城鄆，役人病。有夜登丘而呼曰：『齊有亂。』不果城而還。（同上左傳）

經和傳記載的都很簡略，並沒說到有什麼戰事。但從『城鄆』二字看來，可知鄆城曾經被淮夷攻破；諸侯們擊退了淮夷之後，又幫助鄆人修復他們的城牆。由此可以推知，當時必有戰事。

和這場戰役有關的文獻，還有魯頌的泮水和閟宮。泮水說：

明明魯侯，克明其德。既作泮宮，淮夷攸服。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。淑問如臯陶，在泮獻囚。

濟濟多士，克廣德心。桓桓于征，狄彼東南。烝烝皇皇，不吳不揚。不告于訥，在泮獻功。

角弓其觩，東矢其搜。戎車孔博，徒御無斂。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。式固爾猶，淮夷卒獲。

翩彼飛鶻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穀，懷我好音。憬彼淮夷，來獻其琛。元龜象齒，大賂南金。

魯頌四篇，都是魯僖公時的詩，是沒有問題的。鄭箋於『明明魯侯』四句說：『言僖公能明其德，脩泮宮而德化行，於是伐淮夷，所以能服也。』又箋『矯矯虎臣』四句說：『僖公既伐淮夷而反，在泮宮使武臣獻馘；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。言伐有功，所任得其人。』鄭康成的解釋是不錯的。僖公『既克淮夷』，而『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』；還有『淑問如臯陶』的官吏，『在泮獻囚』。既有斬下的首級，又有捉來的俘虜。那麼，淮之會曾有戰爭，是很顯明的事了。

在閟宮裏，詩人誇張僖公的軍容之盛和國力之強，說：

公車千乘，朱英綠縢，二矛重弓。公徒三萬，貝胄朱綾，烝徒增增。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……

泰山巖巖，魯邦所瞻。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；至于海邦，淮夷來同。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。

『戎狄是膺』，當指僖公十三年馘之會和十六年淮之會而言；戎狄，是指淮夷說。『荆舒是懲』，當指僖公四年魯隨齊侵蔡伐楚來說。可見伐淮夷和伐楚兩事，是魯僖公平生最得意的偉績。侵蔡伐楚，主動的是齊國。伐淮夷救鄆，主動的當是魯國。因為魯鄆既是近鄰，又是近親（魯女季姬，是當時鄆子的夫人。）。那麼，魯僖公對於救鄆一事，照理說應該是首先發動而義不容辭的。

另有尚書的費誓，乃是魯僖公伐淮夷時的誓師之辭。可是，由於歷來的經生們，都說它是伯禽伐淮夷和徐戎的誓辭，以致使它的真象埋沒了二千多年。書序說：

魯侯伯禽宅曲阜，徐夷竝興，東郊不開。作費誓。

史記魯世家說：

伯禽卽位之後，有管蔡等反也；淮夷、徐戎，亦並興反。於是率師伐之於盼，作盼誓。

史記所謂盼，也就是書序的費。此外，尚書大傳作鮮，說文作柴，其實都是一個地方。是知史記的說法，和書序一樣。這說法，直到清代末年，從沒有人懷疑過。

民國十六年十一月，余永梁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(第一集第一冊)中發表了柴誓的時代考一文(後收入古史辨第二冊)，才舉出了一些證據，認為柴誓(即費誓)是魯僖公時的作品。(一)、他歷舉甲骨文、金文、易、晝、詩等早期的文獻，證明西周時代稱徐爲徐方，到春秋時代才稱徐戎。而費誓稱徐戎，可知它不是伯禽時的作品。(二)、費誓的文辭及習用語，和兮甲盤、牧誓、尤其是秦誓等很相近。而兮甲盤是宣王時器，距春秋已不遠。牧誓，余氏疑爲春秋、戰國時的作品。秦誓則是秦穆公時作，和魯僖公同時。(三)、他根據金文的材料，認為西周時代魯侯征伐，應該秉承王命；而費誓中並沒提起『王命』的話。因此，余氏便根據魯頤闕宮、僖公十三年(按：原作十二年，誤。)及十五年的春秋經和左傳，認為『柴誓是僖公伐徐，在費誓時作的』。

後來，楊筠如作尚書叢詁，大部採用了余氏的說法。除了余氏所舉的證據之外，他又舉了泮水的詩句，以強調魯僖公伐淮夷的史實。不過，楊氏只說費誓當是魯僖公時的誓辭，並沒證明是那一年的事情。

接：費誓開頭的一段說：

公曰：嗟！人無譁，聽命！徂茲淮夷、徐戎並興，善敷乃甲冑，穀乃干，無敢不弔！備乃弓矢，鍛乃戈矛，礪乃鋒刃，無敢不善！

這是某諸侯(公)對淮夷、徐戎作戰前的誓師之辭，是絕無問題的。下文又一再的說：『魯人三郊三遂，峙乃楨榦』，『峙乃芻蕘』，可知此諸侯乃是魯公。這也是可以斷定的。余、楊兩氏，說是魯僖公的誓辭；從他們所舉的證據和費誓的本文看來，已很可信。此外，還有一個更堅強的證據。段玉裁的尚書撰異說：

考春秋之初，費自爲國。隱元年左傳云：『費伯率師城郕。』後並於魯，爲季氏邑。僖元年左傳：『公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』，是也。

曾伯秉簠考釋

可知費在魯隱公時代，還是一個伯爵之國；到了僖公元年（或稍前），才變成了魯國的屬邑。費誓是在費地誓師之辭。如果費不是魯的屬邑、而另是一個國家，那麼，魯君決不可能到別的國家裏去誓師。如此說來，魯君在費誓師的時候，費必然已成為魯的屬邑。也就是說：它必定是僖公元年（或稍前）以後的事。僖公元年（或稍前）以後的魯君，有能力伐淮夷而且也真正伐過淮夷的，只有僖公；可知費誓必是僖公伐淮夷時的作品。

再進一步來看，淮之會是在魯僖公十六年的十二月。而費誓說：『甲戌，我惟築。』按照董彥堂先生的中國年曆簡譜，魯僖公十六年（即周襄王八年）的十二月朔日是癸酉，次日（初二日）便是甲戌。這日期和春秋經傳的記載正合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確定費誓是魯僖公十六年十二月淮之會時的誓師之辭。

因為費誓中有『淮夷徐戎並興』的話，以致余永梁氏說費誓是僖公伐徐時在費的誓辭，那是錯誤的。按：僖公十五年春秋和左傳所記載的，是『楚人伐徐』，『三月，公會齊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鄭伯、許男、曹伯，盟於牡丘，遂次于匡。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』（春秋經語），爲的是『徐卽諸夏故也』（左傳語）。那麼，這次戰役，是伐楚救徐，而不是伐徐。所以余氏的說法，和費誓不合。然而淮之會，春秋和左傳都沒說到徐戎和淮夷並興，這也是值得推敲的。我想，可能那時徐國由於受楚國的威脅，而不敢再『卽諸夏』；因而和它的隣邦淮夷，共同病鄆。試觀會于淮的諸侯，並沒有徐國在內；如果徐國還和諸夏之國爲盟友的話，那麼，在最接近前線的徐國，似乎沒有不與會的道理。由此說來，病鄆的主角是淮夷，徐國可能是幫凶。而左傳中只提到主角，沒提到幫凶。或者只用淮夷一名，而概括了徐戎，也是很可能的。（參詩地理考卷四）曾伯秉簠只說『克狄淮夷』，恐怕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總之：曾伯秉簠的『克狄淮夷』，就是指的魯僖公十六年（周襄王八年）諸侯共伐淮夷的故事；詩魯頌泮水、闕宮、和尚書費誓所說的，都是這一史實。而初被淮夷所困，後來又被『用于次睢之社』的，當就是這位曾伯秉。

也許有人懷疑：鄆國憑藉着諸侯的力量，打退了淮夷；而曾伯秉簠的銘辭，却表現得那麼神氣十足。如果此簠的『克狄淮夷』，是指的僖公十六年淮之會而言；那麼，這曾伯能會那樣的貪人之功以爲己力，而不覺得難爲情嗎？我以為這是不足奇異

的。就拿魯僖公爲例吧，他跟着齊桓公侵蔡伐楚，和楚國並沒作戰；而且楚國也並沒有以齊爲首的諸侯們示弱。至於魯國，在這一場合上，簡直地提不到話下。但閼宮却說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！』吹噓得真是使人看了都難爲情。淮之會，主動者雖然可能是魯僖公；但諸侯們究竟還是仰仗着齊的威望和武力。然而試看泮水之詩，大言不慚，對於魯的盟邦們，也一字都沒有提到。而且淮之會以後，魯僖公明明是被齊國捉去，又被釋還；而我們的至聖先師所手定的春秋裏，却說：『公至自會』。越是弱國，越喜歡自我陶醉；這本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何況曾伯有他的近鄰而又是至親的魯君爲典範，容更易東施效顰呢？所以我覺得這個懷疑，是不難解釋的。

附 記

本文寫成後，持以請教於陳槃庵先生，承惠告以下數事：

- 一、費本伯國，後爲季氏邑。此說已見於于欽齊乘，不始於段玉裁。
 - 二、俞曲園以爲春秋時魯有兩個費，費伯城郎的費，當在今山東魚臺縣西南，因爲其地有費亭。說見羣經平議卷三十三及俞樓雜纂卷二十七。
 - 三、丁山從于省吾說，以爲甲骨文之𠂔，乃是曾字。丁氏謂『𠂔讀爲曾』。並說此𠂔和中鼎『在𠂔』的𠂔，都應該在澇水流域。又說『鄫子』和曾伯秉篤的曾，都可能爲此𠂔之後。說見殷商氏族方國志。
- 按：（一）、段氏的說法，當是偶同於于氏，可謂『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』。（二）、費亭之名，不知始於何時；若執此地名便以爲它就是費伯之國，證據實太薄弱。（三）、說𠂔即曾字，似可信。說𠂔是地名，也不錯。然在甲骨文的材料裏，很難斷定𠂔在什麼地方。因爲沒有和𠂔地有關連的其他地名，可以推證。所以丁氏的說法，也成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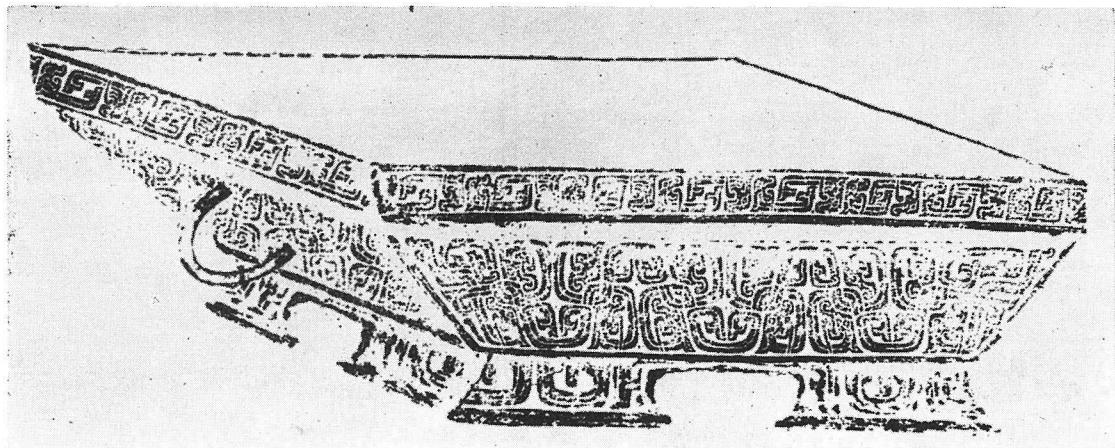
謹附記如上，並謝益友惠教之盛意。——萬里附記。





曾伯秉簠蓋銘

(採自三代吉金文存卷十)



附圖三

曾伯棗簠(器)

(採自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)



附圖四 秦公盨

(採自殷周青銅器通論)



附圖五 陳侯壺

(採自殷周青銅器通論)



附圖六 蟠夔鼎

(採自武英殿彝器圖錄)